



中共粤北省委五里亭旧址
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摄

抗战期间,广东党组织在烽火硝烟中实现飞跃发展

孤悬敌后星火不灭 战火硝烟红旗不倒

文/羊城晚报记者 柳卓楠 丰西西 图/羊城晚报记者 邓鼎园(除署名外)

“宁可坐牢而死,决不跪着爬出去……”这是中共广东省委粤北省委旧址初心剧场内播放视频的一幕,讲述了革命先烈、曾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张文彬同志在狱中面对敌人的残酷折磨,始终对党忠诚、坚守革命理想的光辉事迹。

在一段段光影中,我们的记忆重回80多年前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广东党组织曾遭受极大摧残,省级党组织领导机关一度停止活动。1936年9月,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后,党组织得到初步恢复发展。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广东进一步恢复重建党的各级组织,大力发展党员。党组织在抗战烽火中得到发展,健全了各级组织,党员人数从1937年12月的约1500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2.7万余人。

孤悬敌后,如何保住党组织“星火不灭”? 战火硝烟,如何实现党组织大发展? 日前,记者走访包括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旧址在内的多个红色遗迹,回望烽火硝烟的抗战岁月,探寻星火燎原的红色记忆。

星火燎原—— “有点火苗又会重新燃烧”

“广东是一片被革命烈火炙烤过的红色土地,只要有一点革命的星火,它又会成为燎原之势。”在深圳大鹏新区土洋村内的中共广东省委临委旧址内,大鹏新区博物馆副馆长黄文德感慨道。

广东是近现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也是最早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省份之一。在大革命时期,中共广东区委是全国党员人数最多的地方党组织之一,党员人数一度占全国的六分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围剿”和破坏下,广东各级党组织遭受极大摧残,张太雷、邓中夏、蔡和森、罗登贤等8名历任省委书记先后壮烈牺牲。到1934年9月,省级党组织领导机关被迫停止活动,并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一直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广东党组织才逐渐开始恢复。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广东各地抗日救亡运动持续高涨。当年9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参加完洛川会议的张文彬从延安辗转抵达香港、广东,着力整顿、改组、发展以广东为主的南方党组织,领导华南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在广州成立,28岁的张文彬当选为省委书记。他迅速领导建立中山、东莞等中心县委及多地中心支部,提出“发展一万个新党员”的新任务。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韶关成为战时省会,中共广东省委也迁至韶关,先后辗转市区、南雄瑶坑村、始兴红围、五里亭等地秘密办公。1939年1月,张文彬主持召开省委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提出党组织必须向全省范围发展,必须面向工农、面向农村,大力开展农村工作,提高广大农民的觉悟,加快党在农村的发展。

“日伪军占领大城市,敌人在广大农村的统治力量相对较为薄弱,这十分有利于我们开展各项抗日救亡工作和发展党的组织。另外,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了海陆丰、琼崖、东江等革命根据地,在农村有较强的群众基础和群众力量。”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三级调研员、广东中共党史学会副秘书长张启良说。

至1939年底,广东77个县建立了党的组织,广东地区拥有党员1.8万多人,成为国民党统治区中共党员人数较多的省份之一。据统计,在新发展的党员中,工人党员占7%,农民党员占50%,学生、知识分子党员占40%,其他成分的党员占3%。

除了增加党员数量,广东党组织

还十分注重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政治思想教育。1939年3月—11月,中共广东省委先后在韶关西河坝和曲江马坝举办了四期县级党员干部训练班,共培训100多名党的干部。张文彬经常为党员干部讲课。因积劳成疾,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病,还坚持备课至深夜。

至暗时刻—— 一盏煤油灯救了党组织

在距离广东韶关市区约3公里的浈江区十里亭镇良村牛头冲,两栋黄色的平房静静矗立。这里是中共粤北省委机关旧址,80多年前,这里曾是中共广东省委、粤北省委的一处重要办公点。

在中共粤北省委机关旧址内,一盏看似不起眼的煤油灯,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热血往事。“当年,也是这样一盏煤油灯,挽救了许多我党地下工作者的生命。”每逢游客参观,讲解员都会讲述“一盏煤油灯挽救党组织”的故事。

1942年5月26日,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南方工委)组织部部长郭潜任在韶关被捕后叛变。5月27日凌晨,时任中共粤北省委书记的李大林家被重重包围,事发突然,李大林等人根本来不及撤退。紧急情况下,李大林妻子张瑛迅速将作为接头暗号的一盏煤油灯从窗台上拿走,并关掉窗户。

天亮后,前来接头的同志敏锐地发现,窗台的煤油灯不见了,及时通知各部和有关同志迅速转移隐蔽,避免粤北省委以及南方工委遭受更大的损失。

然而,这场由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中共南委、粤北省委事件”,导致华南地区党组织遭受重创。中共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中共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等人先后被捕,其中张文彬于1944年8月牺牲。

在党中央、南方局的正确指导下,广东党组织贯彻“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干部一律撤退或掩护,党员以群众身份实行勤业、勤学、勤交友的“三勤”活动,重新建立交通站,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组织一律暂时停止活动,有效地制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扩大,保护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

红旗飘扬—— 揭开华南抗战新篇章

“延安,延安,我是东江!”1942年春,位于深圳大鹏湾畔的东江游击队驻地内,一部电台手摇机发出“呜呜呜”的响声,一位电台人员正戴上

耳机,按动电键,试探着用秘密呼号呼唤着远方的“延安”。在经过多次的呼叫后,终于得到了回应。华南上空飘荡的這一抹红色秘密电波,从物理上连接起了静默许久的广东党组织与远在延安的党中央。

“南委事件后,广东地区唯一与党中央保持联系的根据地电台就在东江。”在位于深圳大鹏新区土洋村的中共广东省委临委旧址内,黄文德向记者说道。

在遭受严重破坏并度过了一段蛰伏期后,广东省级领导机构开始恢复。1943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广东省委临时委员会在大鹏半岛成立,隶属于中共中央南方局,与东江军政委员会共同领导广东沦陷区的党组织和抗日武装斗争,省临委机关设在东江游击区内,尹林平任书记。

“可以说,省临委成立后,揭开了华南抗战的新篇章。”黄文德介绍,此前,中共广东省级领导机关处于国统区内,腹背受敌,在敌人眼皮子下工作,十分危险。而如今省级领导机关位于东江游击区内,党与军队在一起,更安全,也更利于指导抗日武装斗争。

1943年12月2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基础上,宣布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尹林平任政治委员,下辖7个大队。

1944年8月,广东省委和东江军政委员会在大鹏半岛土洋村召开联席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全面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同时提出全面恢复党的组织活动。

“土洋会议的召开,对加强广东党组织建设、军队建设和抗日根据地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广东人民抗日武装发展的转折点,抗日武装斗争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黄文德说。

1944年10月起,党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武装开始向全省发展,除东江纵队、琼崖纵队外,还先后建立了珠江纵队、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和韩江(潮汕、梅埔)纵队等抗日武装力量。

此外,广东省委还高度重视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建立了一系列抗日民主政府和联乡办事处。例如珠江纵队组建了范围遍及八个县面积近1000平方公里的珠江三角洲抗日根据地,人口近40万。在统一战线方面,广东省委在领导华南敌后抗战过程中,积极开展国际统战工作,通过多渠道多方式与美英盟军建立了合作关系,营救盟军人士,开展军事情报合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4年以后,各地党组织陆续恢复活动,党的各项工作得以重新开展,并有了新的发展,尤其在部队中党员数量大幅提升。数据显示,到1945年,仅东江纵队的党员就发展到2200~2500人,部队党员比例达到29%。



南委事件后,广东地区唯一与党中央保持联系的根据地电台就在东江。该图为广东省委临委旧址内模拟的电台模型

历史档案

抗战期间广东党组织 经受严峻考验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中共广东省委被迫迁往粤北。中共广东省委立即决定,迅速在全省各地建立人民抗日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独立自主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广东人民抗日武装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后发展为著名的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和韩江(潮汕、梅埔)纵队等七个纵队,共2.8万余人。

抗战中,广东党组织高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从广东实际出发,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武装斗争,指引、推动了华南抗日战争在曲折的道路上,不断走向胜利。党组织在抗战烽火中得到发展,健全了各级组织,党员人数从1937年12月的约1500人,发展到抗战胜利前夕的2.7万余人。广东党组织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赢得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记者手记

点点星光凝聚力量 撑起华南抗战脊梁

回望百余年辉煌历程,党的发展道路绝非一帆风顺,党的成长注定要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中披荆斩棘、艰难前行。这次采访,是一场与信仰的对话——那些在烽火中重生、在绝境中壮大的广东党组织故事,字字句句都浸透着热血与赤诚。

当敌人的铁蹄踏碎山河,一颗颗坚定的心如点点星光,在岭南大地聚拢,凝聚起坚不可摧的强大力量,撑起了华南抗战的脊梁。

那些泛黄的档案、斑驳的老照片和熟悉的名字,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大发展”从来都不是数字的变化,而是无数颗滚烫的爱国心,在国难当头时选择与信仰并肩。

当年轻的手掌抚过时代的记忆,当稚嫩的嗓音唱起激昂的战歌,我们真切感受到,伟大抗战精神穿越时空,在新时代里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丰西西 柳卓楠)

专家点评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三级调研员、广东中共党史学会副秘书长张启良:

重视群众动员 突出“三个结合”

羊城晚报记者 丰西西 柳卓楠

抗战期间,广东党组织为何能够实现飞跃性的大发展? 羊城晚报记者采访了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三级调研员、广东中共党史学会副秘书长张启良。

羊城晚报: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广东党组织面临怎样的基础与困境?

张启良:在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中,广东党组织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总体上来看,还存在较多问题。一是党的基层组织还不健全,各地空白点比较多;二是党员的数量不多,党员发展较慢;三是党组织发展区域不平衡,城市多,农村少;四是党员的成分复杂,党员素质参差不齐;五是党组织的活动区域狭小,活动范围受限。同时,“南临委”与广州市委存在较为严重的“意气之争”,严重影响了党内团结和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上面这些情况,远远不能适应华南抗战的需要,迫切需要加以改变。

羊城晚报:广州沦陷后,广东省委转移工作重点对党组织大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张启良:实践证明,省委将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向广大敌后农村,对广东党组织的大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至1939年底,广东77个县建立了党的组织。根据档案文献资料记载,全省党员的结构发生较大的新变化,在新发展的党员中,农民党员占到了50%的比例。这说明,这一战略性转变是完全正确的,农村逐渐成为我们党领导华南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

羊城晚报:抗日战争时期,广东党组织如何深入发动和组织群众?

张启良:“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力量。抗日战争时期,广东党组织十分重视群众动员工作。具体说来,主要突出“三个结合”:一是把群众动员工作与抗日救亡运动结合起来;二是把群众动员工作与抗日武装斗争结合起来;三是把群众动员工作与抗日民主政权、抗日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通过“三个结合”,广东党组织有效地把南粤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发动起来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抗战,抗战热情普遍高涨。

广东毗邻港澳,又是著名的侨乡,争取、发动华侨和港澳同胞支持国内抗战是广东抗战的一个显著特色。广东党组织多次派人到香港、澳门、南洋各地开展抗日宣传,发动华侨和港澳同胞捐款捐物支援抗战,动员和组织回乡服务团回国参战。抗战期间,回国参战的粤籍华侨达4万多人,有的还在抗日战场上献出宝贵生命,仅琼崖回乡服务团就牺牲了100多人。

羊城晚报:抗日战争时期广东党组织大发展,对于坚持华南抗战、配合全国战场、最终赢得抗战胜利,起到了什么作用?

张启良:广东党组织在华南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华南抗战的过程中,广东党组织的大发展,主要起到了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伟大旗帜,带领全省人民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促进南粤人民的抗战觉醒;二是建立人民抗日武装,开辟华南敌后战场,沉重打击和牵制大量侵华日军,也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三是加强与太平洋东方战场的美英盟军开展军事、救援和情报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羊城晚报: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对今天我们加强党的建设有何启示?

张启良:华南抗战历史表明,党的领导是关键,伟大的事业需要强大的民族合力,困难和挑战挡不住前进的脚步。

新征程上,要始终把加强党的建设放在首要位置,不断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宗旨教育,永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继续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团结各方力量,凝聚共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要继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敢于克服一切困难,敢于勇闯激流险滩,在时代风雨的洗礼中,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力量。